



宗教与内心和谐

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



全球文明研究中心 | Institut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

蔡德贵
编著

目录

宗教与内心和谐

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



全球文明研究中心 | Institut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

蔡德贵
编著

宗教与内心和谐

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

- 编著 : 蔡德贵
封面设计 : Steve
排版 : 阿丰
出版 : 博学出版社
地址 : 香港湾仔骆克道 348-350 号
恒发商业大厦 6楼 B 室
出版直线 : (852) 8114 3292
电话 : (852) 8114 3294
传真 : (852) 3012 1586
网址 : www.globalcpc.com
电邮 : info@globalcpc.com
发行 : 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
印刷 : 丽星国际
国际书号 : 978-988-19378-2-7
出版日期 : 2010 年 7 月
定价 : 港币 \$48

© 2010 博学出版社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翻译或转载。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如有钉装错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络更换。

“科学、宗教与发展”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和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旨在通过汲取宗教的精神原则以及科学的方法与理论达到推动促进社会发展的话语构建。丛书包括会议论文集、外文书籍的译本和原著。

目录

序	蔡德贵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所长.....	4
一	“获得精神寄托”和“寻求功利目的” 的启示 张新鹰.....	7
二	构建内心和谐与繁荣社会的七大原则 江绍发.....	14
三	内心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蔡德贵.....	24
四	论马克思主义的内心和谐观 郝立忠.....	33
五	理解中庸：求得现世与心灵的和谐 刘宗贤.....	52
六	论儒家的内心和谐观 张进.....	58
七	宗教精神的缺失与高犯罪率 蔡德贵.....	65
八	发挥灵性力量的重要性 陈思宇.....	77
九	谈《古兰经》、“圣训”的内心和谐观念及 其影响 张玉营.....	85
十	巴哈伊信仰与当代大学生和谐心理建设 许宏.....	95
十一	略谈道家内功的养生效用 曾传辉.....	104
十二	从《维摩经》的“秽土成佛”探讨建设人间 净土的可行性 觉继.....	115
十三	佛教的出世观 广兴.....	135

宗教与内心和谐

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



全球文明研究中心 | Institut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

蔡德贵
编著

“科学、宗教与发展”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和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旨在通过汲取宗教的精神原则以及科学的方法与理论达到推动促进社会发展的话语构建。丛书包括会议论文集、外文书籍的译本和原著。

目录

序	蔡德贵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所长.....	4
一	“获得精神寄托”和“寻求功利目的” 的启示 张新鹰.....	7
二	构建内心和谐与繁荣社会的七大原则 江绍发.....	14
三	内心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蔡德贵.....	24
四	论马克思主义的内心和谐观 郝立忠.....	33
五	理解中庸：求得现世与心灵的和谐 刘宗贤.....	52
六	论儒家的内心和谐观 张进.....	58
七	宗教精神的缺失与高犯罪率 蔡德贵.....	65
八	发挥灵性力量的重要性 陈思宇.....	77
九	谈《古兰经》、“圣训”的内心和谐观念及 其影响 张玉营.....	85
十	巴哈伊信仰与当代大学生和谐心理建设 许宏.....	95
十一	略谈道家内功的养生效用 曾传辉.....	104
十二	从《维摩经》的“秽土成佛”探讨建设人间 净土的可行性 觉继.....	115
十三	佛教的出世观 广兴.....	135

序

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气氛，市场经济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但是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不和谐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涉及到众多方面，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但是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每个人内心的和谐。内心的和谐是其他和谐的前提，为此，2007年5月19-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巴哈伊教研究所等单位主办，青岛大学《东方论坛》编辑部承办的“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山东、福建、广东和港澳地区的学者、研究生近30人出席会议，就各宗教关于内心和谐与社会和谐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发表论文18篇，并相互介绍了各自认识和研究巴哈伊教的情况。次年，香港教育学院在2008年6月23-24日召开了一次“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心灵与世界公民研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大陆和香港、澳门的学者积极发表论文，探讨内心和谐的问题。与会学者就道家、儒家、马克思主义、佛教、伊斯兰教诸方面发表了论文，探讨了这些文化和思想对内心和谐、心灵平和的追求和对当代社会建设和谐局面的借鉴意义。我们从这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中选出了一些以内心和谐为主题的文章，编成这本论文集。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12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主张“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努力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温家宝总理2006年看望95岁的季羨林先生时，两人有一段关于“和谐”的谈话。季羨林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

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总理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温家宝把人内心的和谐与集体、社会、国家深刻地联系起来。

胡锦涛提倡的实现宗教关系的和谐，关键是宗教徒内心要首先实现和谐。只有内心和谐，才能对其他宗教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促进整个社会和世界的和谐。也只有内心和谐，才能实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希望这些探讨内心和谐的论文能够引起有关方面学者的注意，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一点作用。

我们相信，宗教和传统文化对内心和谐的追求，必将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之间的和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在实现内心和谐的前提下，就为期不远了。

蔡德贵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所长

一. “获得精神寄托”和“寻求功利目的”的启示

张新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宗教信仰者群体在我国从“文革”前后的社会边缘区块变成相对重要的社会力量，只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0多年时间。群体规模前所未有的增加，是这种变化的最显著标志，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速度继续扩大，看不到停滞的迹象。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冷战宣告结束、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思想格局受到强烈震荡、改革开放路线受到严峻挑战的国内形势面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摆脱了一度可能陷入姓“资”姓“社”争论的误区，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建设的强大威力以令世人瞩目的速度和效率拉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在20世纪的末叶创造出了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规模持续增长的“中国奇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融入WTO的进程，中国社会转型的幅度明显加大。与经济成分多样化和私营经济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的状况相对应，社会资产的再分配促进了社会科层结构的重组；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原有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逐渐遭到削弱，社会成员思想文化诉求的多元化嬗变在精神产品市场化、文化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中成为无可逆转的现实。“乡土中国”不再是一片田园风光，“红色巨龙”展现出五彩斑斓的形象。同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千头万绪，作为一项极其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难免出现某些政策空缺和操作失误，甚至是局部的人为脱轨。这些缺失被由于天然的地区差距而历史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

的传统管理模式和思维习惯所放大，被党内腐败现象的增多和道德标准公许度的紊乱所凸显，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社会道德失范、社会风气恶化、社会问题高发的集中印象；有的问题愈演愈烈，虽然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但收效甚微，导致政府权威性下滑，法律公信力流失，人际疏离感增强，社会稳定性降低。对此，一种“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是社会矛盾突出期”的理论应运而生，似乎为把所有负面现象归结为“发展的必然”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不论这种解释是否无意间会给某些违背科学发展观、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找到遁词，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由于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艰难程度不断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宗教信仰者群体在这个时期的扩大，当然有其历史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社会根源，而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同样是与社会根源密不可分的。从宗教信仰者群体的增长之中，既折射出社会矛盾的突出和社会心理状态的复杂，又反映了一部分社会成员寻求自我纾解这些矛盾的努力。

1997年湖北省对于佛、道教信仰者信教原因的调查结果有助于管窥上述判断之一斑。该调查将信徒信教心态划分为5种典型：第一，求富求安型，占被调查人数的50%，其中因为贫困、祈求生活富裕的占72%，追求现世平安的占18.7%，追求来世幸福的占19.6%；第二，寄托型，占被调查人数的26%，包括5.9%看破红尘，寻求精神寄托，6.2%身患重病，寻找解脱，7%渴望神灵给予智慧，7%渴望灵魂得到净化；第三，求知型，占被调查人数的9.8%；第四，不满型，占被调查人数的20.5%，包括19%对社会丑恶现象看不惯、对利益分配不公想不通，导致心理严重失衡的以及1.5%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的；第五，传承型，即家庭世代信教。¹ 这当中标出的比例数有复选成分在内，有的大项下的小项归属也可斟酌（如“寄托型”中的“身患重病”也许可以归入第一项），但无论如何，第一、第二、第四种典型显然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而且应该互有交叉渗透，其中“不满型”信徒比例之高，以及“求富求安型”和“寄托型”信徒向“不满型”转化的潜在可能，值得引起各方面注意，而宗教信仰对于“不满型”人群的消纳，无疑也给社会设置了一道“缓冲区”。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反映“社会人”个体存在状况的精神现象，有

着给予信仰者心理抚慰和情绪激励的作用。就信仰者皈依宗教的目的而言，“获得精神寄托”是较具有普遍性的动机。而这种“精神寄托”，多体现为对于道德纯洁、人际友爱的向往，也体现为对提升自身精神境界的渴望和对个人“灵性”需求的满足。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2003年在浙江、福建的调查显示“两个62.3%”的巧合，即接受调查的佛教徒中，62.3%的信教时间在10年以内，62.3%的人接触佛教的原因是“寻求解脱和觉悟”；同时，22.1%的人认为佛教能重建社会道德，21.7%的人认为佛教能使人类相互友爱，16%的人认为佛教能够建设精神文明。² 2000年辽宁省委宣传部的调查发现，“信服教义”和“追求人格完善”排在辽宁省居民信教动机的前两位。³ 洛阳师范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河南农村青年信教情况的调查资料中，83.91%的被调查教徒认为信教能够丰富人的精神生活，59.77%认为信教后“收获很大”。⁴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组2007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中，24.1%的宗教信仰者信教原因是由于宗教“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20.3%是为了“精神充实，心境安宁”。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甯对北京基督徒的调查表明，高达92.8%的信徒认为基督教能够为中国的道德重建发挥影响；她的调查同时还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基督徒当中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应该比非基督徒“好得多”的占77.7%，认为应该“至少好一些”占20.8%，而一般的非基督徒也认为，基督徒应该比普通人“好得多”。⁶ 由于调查者的问卷设计和调查方式不能完全排除造成不实答案的可能，以上部分资料的参考价值或许有一定局限，但宗教通过给予人们超越实存、完善自我的希望而对信仰者产生切实的慰借和信靠作用，则是无须怀疑的。而且，这种作用的发散效应正在社会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同。普通群众把本来可以从主流社会生活中得到的精神需求包括道德追求转托于从宗教实践中获取，表明宗教群体正试图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更大程度地担负起社会崇高精神资源集散中心的职能。

但是，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中国目前宗教信仰者“终极关怀”的“超越性”，好像所谓的“灵性需求”或“心灵安顿”已经构成了皈依宗教的最主要原因。必须看到，除了“精神寄托”以外，出于功利主义的取向（即以所谓“求安求富”为代表的实际利益诉求）而进入宗教群

体，在新增宗教信仰者中所占比例还是最大的。即使信教原因主要是希望“获得精神寄托”，或者是由于家庭和别人的影响，也都不能排除信仰者个人对于信教可以实现某些非常具体的现世功利性目标的向往。在期望值不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正常世俗社会的途径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功率越低，通过宗教途径进行尝试的驱动力就会越强。虽然有研究以农村基督教徒为例认为可以从“灵验型”信仰生发出“心灵救赎的祈求”，也还是无法否认乡村基督教的特点是“因‘灵’称信”的。⁷正是在这种情况面前，上述“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组也才得出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更多是比较基于现实主义的。来源于宗教自身寄托心灵的思考较少”的结论。⁸作为自古以来随机性、实用性多神崇拜极其发达的中国，这是她的宗教文化传统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本能地赋予宗教信仰者群体的“本土化”特色。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固然是如此，在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方面，这一点无疑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2006年，中国城镇化水准达到43%，相对于此，1600万以上的基督教信仰者则有约80%是农村居民。迄今为止的城镇化进程中，新增基督教徒人数的重心却在向农村人口倾斜。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研究普遍认为，农民信教增多的原因包括农村教育、科技和医疗更落后，文化生活更单调，社会保障制度更缺乏，等等。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原因是因病信教。当前，我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其中大多数是农村人口。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相对于这种看不起病的现状，一些基督教农村传道人所宣扬的“祷告治病”和一些“因为信主而病愈”的所谓“见证”，不可避免地会对许多农民产生吸引力，成为他们接受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动因。据河南的统计，41.38%的农村基督教徒称自己信教是为了“治病”⁹；另有研究者认为，在基督教发展迅速的广大农村，抱着不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希望而入教的信徒占60%以上。¹⁰基督教的“祷告治病”与传统佛、道

教和民间信仰往往是个人各自“求神（佛）免灾”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基督教的“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群体的共同体验中进行的，没有治疗者与被治疗者之分。农村基督教会通常都在聚会礼拜中专设为某些有病痛或不平安的信徒记名祈祷的程式，个别教会的年轻教职人员有意淡化“医病赶鬼”的气氛，取消记名祈祷程式，让“有需求”的信徒独自在家祷告，结果很多信徒不满意，参加聚会的人数便逐渐减少。这种“正”“反”情况的对比，使基督教组织活动的社会属性显露无遗。¹¹

世界历史表明，基督宗教信教人口战后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虽然各国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都与城市化进程中造成的社会动荡、文化认知失范有关；在此形势下，基督宗教凭借其强劲的传教实力，占据了大片“禾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其《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来临》一书中，用大量事实揭示了“基督宗教世界的重心正在坚定地向‘世界南方’即第三世界转移”的趋势。基督教在我国迟来的发展，总体上与这种趋势相符；甚至广大农村信徒为治病而入教的现象也与詹金斯的“大部分南方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相通之处——也是他们最大的卖点——就是强调信仰可以治病”，“因为医疗保健对大部分穷人而言遥不可及”¹²的说法不谋而合。但是，基督教信教人口的快速增长在我国又表现出了异常复杂的特征，其原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我国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传统民族文化浩劫。“文革”后20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实际上是这场浩劫的后果在相反的社会意识条件下的继续扩大。

基督教进入中国200年，长时间里发展缓慢，是因为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强烈抵制，以致不得不谋求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本色化”改革。而如果传统文化的屏障已不再稳固如昔，长期的“三自”运动又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外国主流教会的“洋教”模式对中国基层社会基督教社群的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国人像接受佛教、道教那样接受起基督教来，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事实上，农民信徒用残留在习俗中的民间信仰的眼光看待传到他们身边的基督教，是基督教在农村普遍碰到的境遇。同时，基督教因为非常符合近现代以来我们受西方观念影响

而形成的宗教认知标准，客观上得到了更能充分伸展的政策空间。而在农村大量涌现的本土民间信仰“神庙”，本来多属农民信仰需求的合理产物，则依然没有走出被视为“封建迷信”的阴影。佛教、道教虽然可以合法存在，但在农村活动场所的普遍短缺及其内敛型的传教方式，以及部分上层教职人员的“官僚化”、“贵族化”给贫苦信众造成的疏离感，特别是参加宗教活动的经济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信徒的增长率。

在广大信众功利主义的信教动机面前，经济法则自然而然地被引入信仰选择的过程。农民大量选择基督教的原因之一，就是信仰它的经济成本一般比较低，而同时被许诺可以得到最大的功利效益。一首传教的民谣唱道：“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多少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¹³ 我国基督教的情况提示人们，当一些宗教致力于占领城市高端市场的时候，以农村为代表的低端市场需求必然会有另外的宗教力量去填补。在信徒的功利目的面前，必须重视“信教成本”对于宗教市场竞争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社会变革加深、各类矛盾增多的现实当中“获得精神寄托”和“寻求功利目的”，是刺激我国宗教信仰者群体包括基督教群体迅速膨胀的两个重要原因，但基督教的发展又得益于特殊的主客观便利条件。宗教信仰者能够从宗教当中求得安定心态、化解躁郁的力量，奥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实用追求被信仰涂上了一层神圣性的色彩，“圣”、“俗”的界限趋于模糊。由于历史的传统的作用，这种神圣性从个体人的主观意识中异化出来而具有了客观存在的性质。宗教信仰者以个人方式接受客观“神圣性”存在的过程，是一个主观意识演变和异化自我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在相互平衡的前提下对于信仰者精神欲望和物质欲望的满足，也是一个实现个人“神圣化”以理解和嵌入“神圣性”的过程，两种欲望之于宗教存在的意义并非水火不容。这一“神圣化”的过程，将以不断达到宗教信仰者内心和谐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而呈现其最高价值。当然，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众而言，这又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需要的不仅是广大信仰者的努力。